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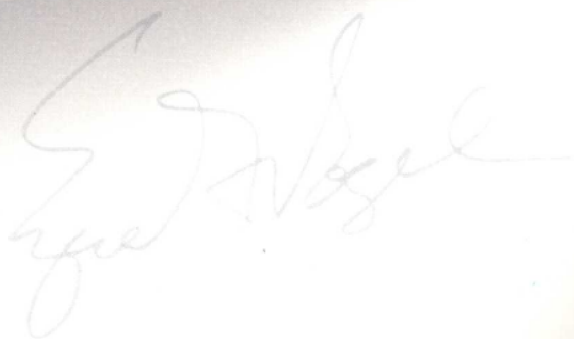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
高申鹏 译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

高申鹏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美]傅高义(EZRA F·VOGEL)著；高申鹏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6
(傅高义中国研究译丛)

ISBN 978-7-218-05824-5

I. 共… II. ①傅…②高… III. 广东省—概况—1949~1968
IV. K9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9723号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著 者/[美]傅高义(EZRA F. VOGEL)

译 者/高申鹏

出 版 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责任编辑/倪腊松 崔肇钰

整体设计/卢小雅+何 筠

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总 经 销/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各地书店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5.5

插 页/4

字 数/380千

版 次/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978-7-218-05824-5

定 价/48.00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020-37579695】



2006年6月7日，傅高义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学术演讲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 1737 CAMBRIDGE STREET • CAMBRIDGE, MA 02138 • TEL: (617) 495-4046 • FAX: (617) 495-9976

Ezra F. Vogel, ~~Professor~~
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授权书

我于 1969 年写了一本关于解放后广东省二十年变化的书:
“CANTON UNDER COMMUNISM”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现在我委托高申鹏博士将此译成中文, 以便于在中国大陆
出版发行.

傅高义

傅高义

Ezra F Vogel

2005年8月4日

出版说明

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是当今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有名的“中国通”。他对中国有着深入而持久的观察和研究，具有“中国先生”的美誉，甚至对中美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都具有独到的影响力。

有趣的是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傅高义先生选择广东开始了他对中国的研究；他在香港隔岸而观，收集书籍、报刊资料，几乎读遍了当时广东方面出版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上游》（广东省委杂志）等报刊，同时对从广东到香港的人进行访谈，并最终撰写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一书，阐述了从1949—1968年这20年间在广东在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而激烈的政治运动，以及广东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虽然他当时不能到广东实地考察，但已经很靠近广东，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使他的研究颇为客观而真切，以至于他在时隔38年之后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道：“当我翻回我在1969年写的这本书时，我惊讶于书中自己竟能对广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耄耋之年，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虽然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的叙述、他的观点并不完全能为我们所接受，但足资参考借鉴，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确实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有关广东的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并叹服他对于新中国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广东的城市和农村的熟悉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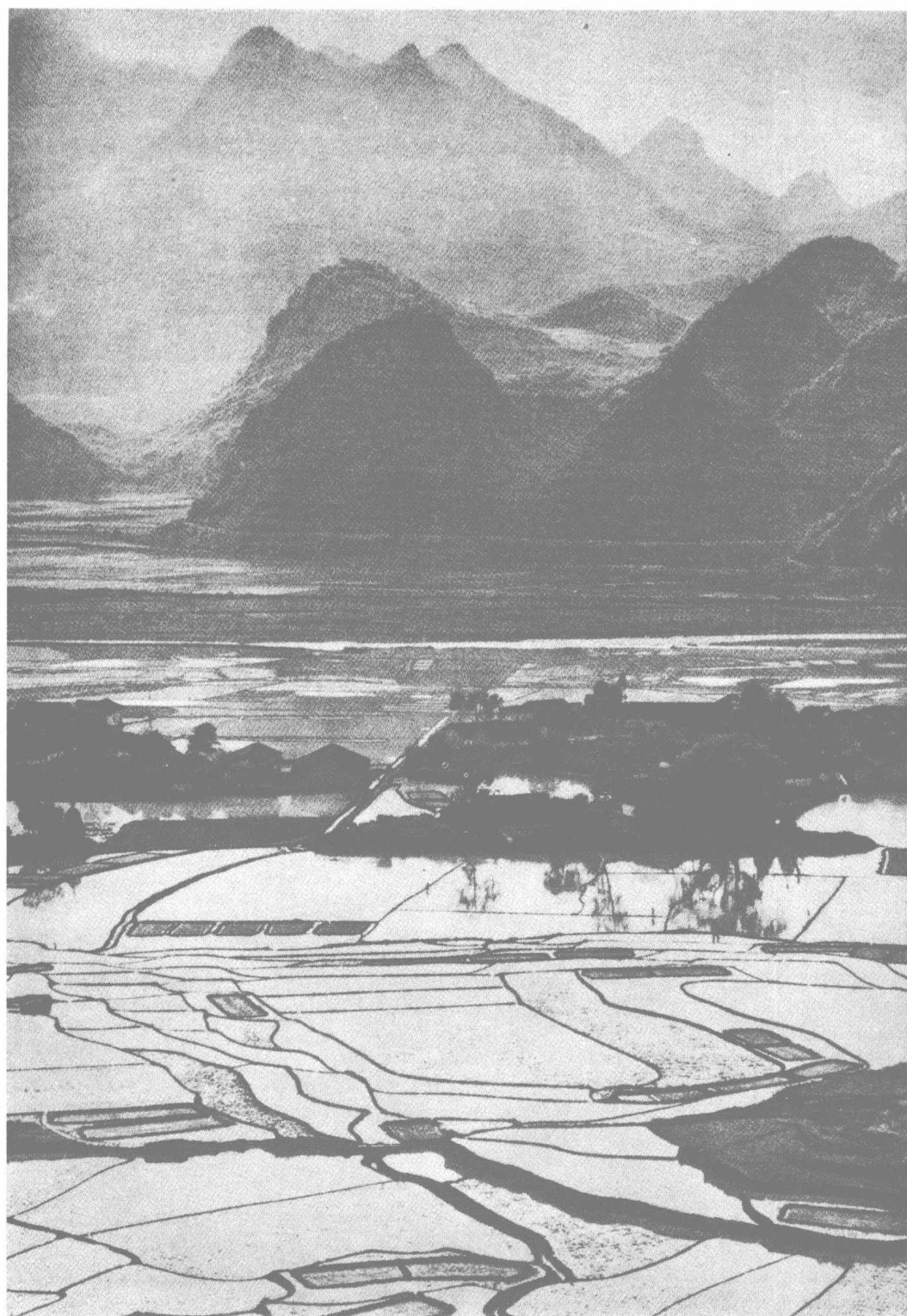
更看到了一个西方学者的严谨学风及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他便受到了当时广东省领导的邀请，自1980年，傅高义先生首次访问广东之后，每年至少访问广东一次。他参观访问了当时所有14个地区和地区级单位，以及3个经济特区，走访了广东100个县中的70多个，包括一些贫困县，并采访了30多个县级官员。所到之处，无不待之如友朋，坦诚交流，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量资料。傅高义先生也因此完成了他研究中国研究广东的第二部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我社在1991年经授权出版了该书中文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傅高义先生的这两部书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能让我们较为清晰而完整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如何走向改革开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艰难曲折的伟大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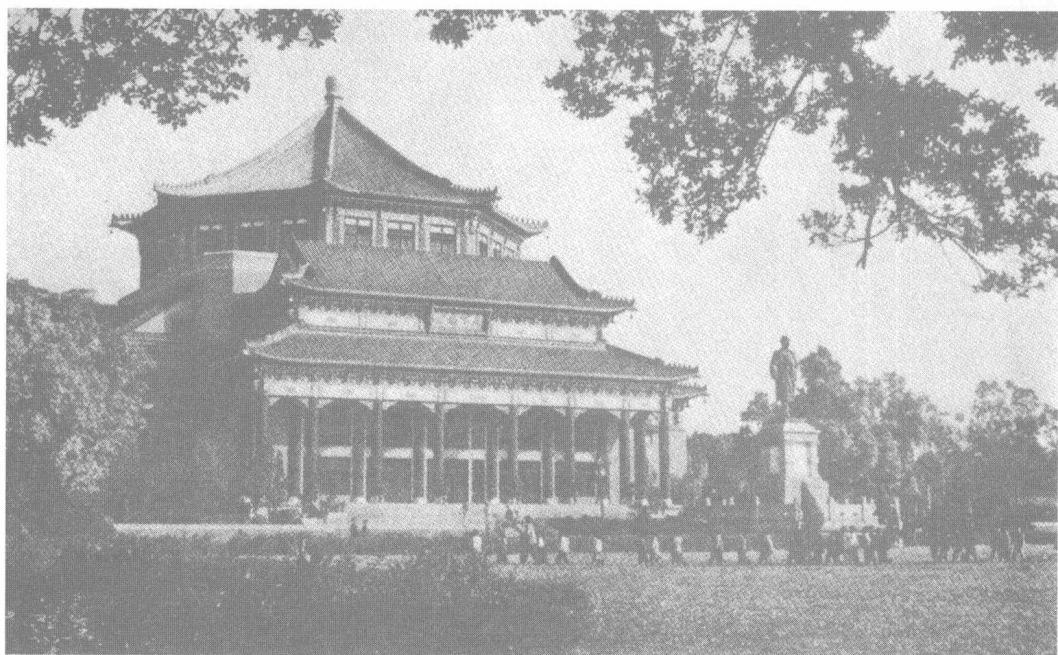
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傅高义先生关于《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两书的授权，并在此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版和再版这两部著作的中文版，自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编 者

2008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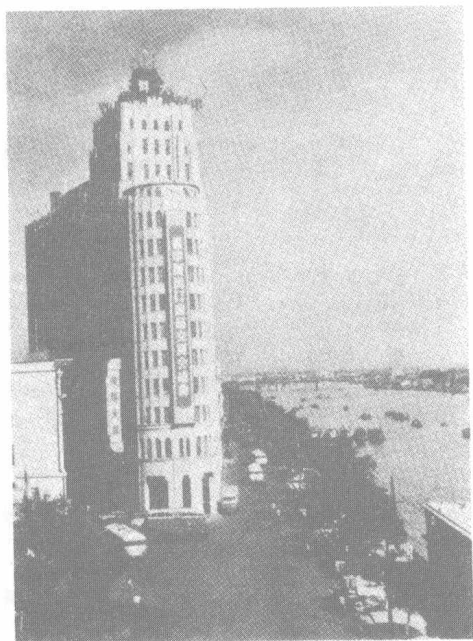
春耕时节的广东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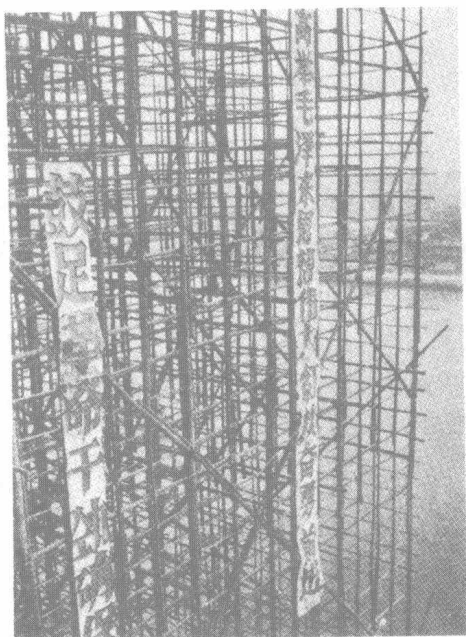
中山纪念堂，当时广州最大的室内会议场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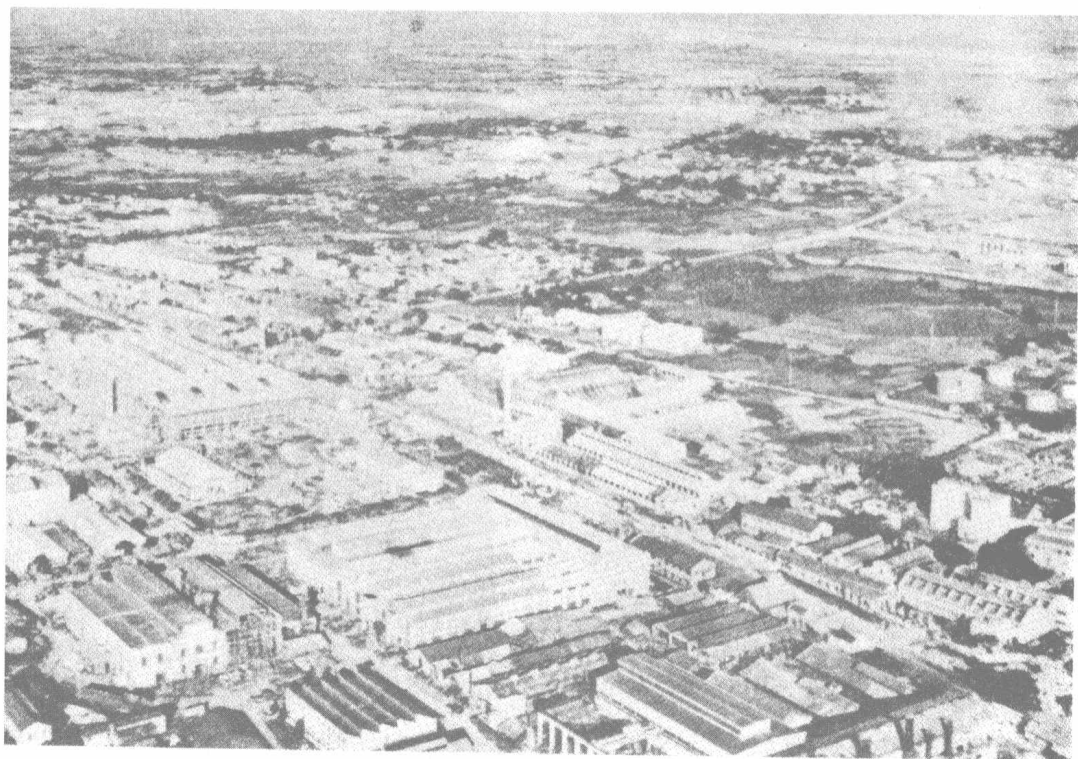
从前广州和珠江边的最高建筑——
爱群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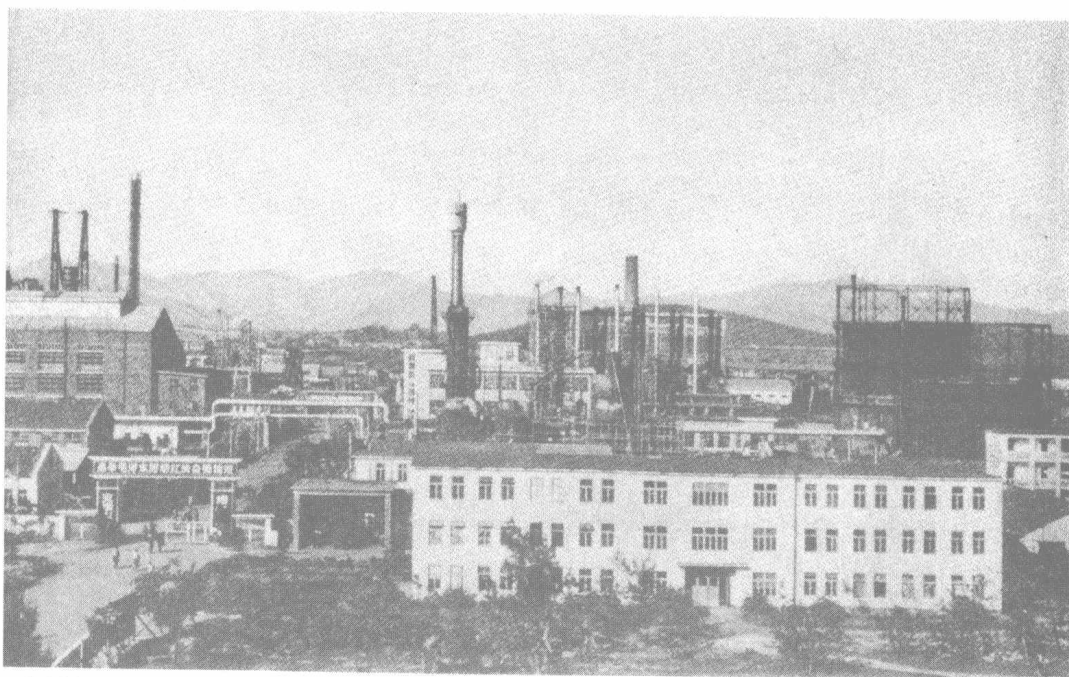
1967 年初正在建设中的一座 27 层的新
建筑，上面悬挂着“高举毛泽东思想
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的标语



沿珠江边的广州商业中心区



位于南岸的广州主要工业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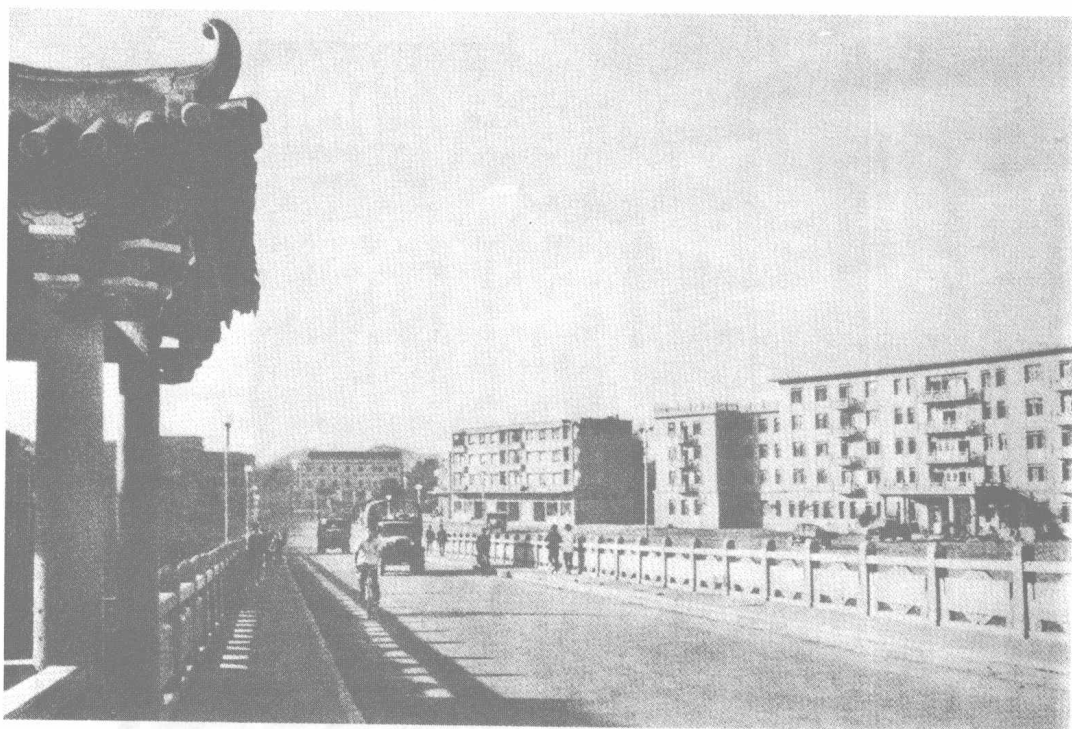
广州化肥厂，大门上方悬挂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前进”的标语



由寺庙改造成的公社大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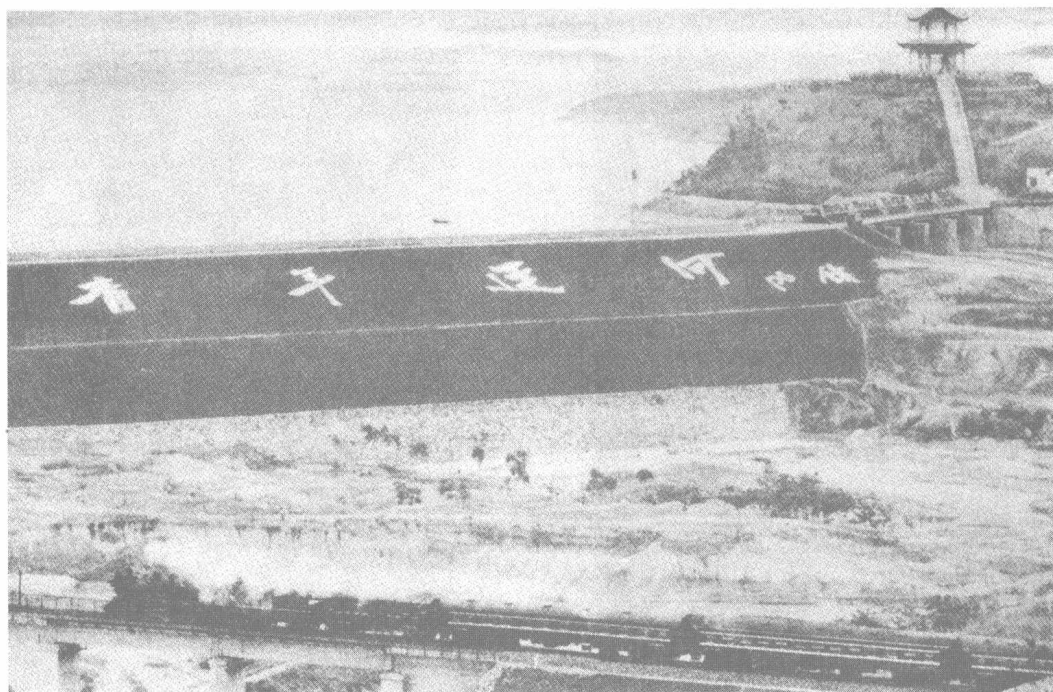
欣欣向荣的公社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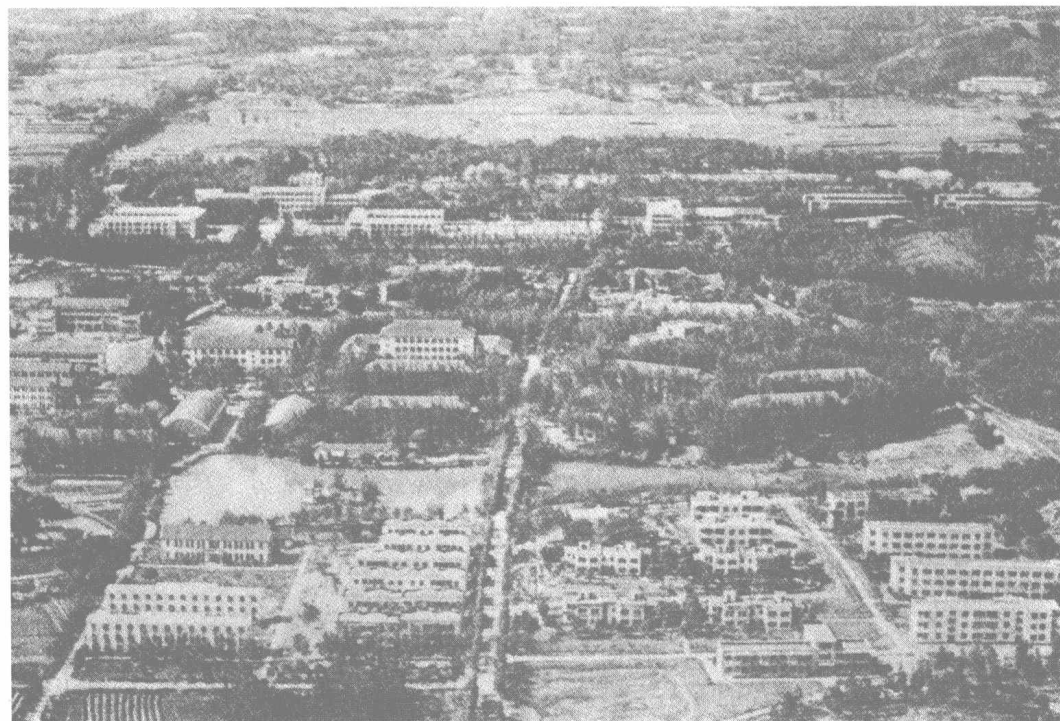
典型的新型公寓楼房（韶关）



1965年2月，区梦觉、李坚真、陶铸、陈郁、赵紫阳和王首道在广州领导了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建成的广东工程——青年运河，名称署名为陶铸题写



广州东北部的大学区



叶剑英



方方



朱光



曾生

序 一

我 36 年前撰写的英文著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译本的问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倍感欣慰。由于该书中详细地涉及了地方主义等问题，故诸如此类的出版物难以面世。今天能出版拙著的中译本，深深领悟其深远意义。在此我深谢我的朋友高申鹏先生为中译本所作的极大贡献和付出的辛勤的汗水。高先生具有长年生活和工作于广东的丰富经验，十分谙熟广东情况，并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因此方能非常称职而出色地完成此项工作。

1969 年，当我完成该书的时候，还处于“冷战”时期，也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两年后，基辛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离开哈佛大学教职不久），应毛泽东的邀请访问中国，开始为恢复中美关系奔波。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学者寥寥无几。1949 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中美间的敌对关系也随之形成。中美两国的爱国主义情结都很深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当时由于反对洋奴，大学里或研究机构无法公开、客观地研究美国。相形之下，美国的亲中知识分子却不像中国的亲美文人所遭受的排挤那样深重，但是当时在美国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也存在同样的压力。在冷战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下，中国知识分子若公开学习和崇尚美国，简直如阳春白雪。而美国大学里的当代中国研究者也有类似的问题。

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对中国的研究，认为应该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状况。其实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一些美国政治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败北于台湾，所以我

们不要花很大的力气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是我们专门学当代中国的学者不同意这个看法。到了50年代后期，多数美国文人已经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将会长久存在，应该是培养研究当代中国情况的人才的时候了。美国基金会同意并支持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但是面临的问题是由谁来教授和培养人才，苦于既无师又无徒的尴尬局面。这时，一些大学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他们已经分别学习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因此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当时费正清选拔了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费正清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我任副主任，1972年费正清离任时，我便成为他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接班人。

1964年我开始执教鞭于哈佛。1961年至1963年我在哈佛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今天回顾起来，我们的规模虽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很少见。由于敌对关系，也难以赴中国内地寻找资料。对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中国研究者来说，当时最佳之地首先香港。香港很开放，中国的报刊基本上都有，所以资料还是丰富的。而这些资料大都是从香港之邻的广东转道而来。1962年，陶铸让一些人从广东渡至香港，因此给了我们这些外国学者与来自广东的人们交流与谈话的良机。虽然其中不乏偏见之谈，但还是有很多客观理智的智者之见。一些判断失误在所难免，我们外国学者也极力辨明是非，做到实事求是。

1963年夏季，我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其间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我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也有一些美国特工人员从事收集中国情报的工作。而我们这些学者在研究目的和角度方面却迥异于那些报刊记者和特工人员。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研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